

两方墓志与三场葬礼：

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另类风景

徐冲

一方墓志对应一场葬礼。冯熙、冯诞这父子二人的两方墓志，为何会有三场葬礼？剥开正史文本和墓志文本的层层包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太和十九年（495）的北魏，围绕父子二人是归葬旧都平城还是新都洛阳，有三场葬礼依次展开，最终造就了今天所见的冯熙墓志——这一升格的纪念装置，以及之后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。

“突兀而至”的墓志文化

太和十七年（493）至十九年（495）间，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经营百年的代北平城，迁至已荒废近两百年的西晋故都洛阳，由此开启了北魏王朝后半程的急遽转身与国家重构。此即国人耳熟能详的孝文帝迁都。20世纪以来，在洛阳城、永宁寺、龙门石窟等可视化的宏观巨构之外，以城北邙山一带为中心持续出土的大量墓志，在为北朝史研究不断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，也逐渐成为我们想象北魏洛阳时代时不可或缺的文化图景。

虽然大多数北魏墓志均系盗掘出土，并未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整理，但已足以让我们了解，在北魏洛阳时代，墓志是精英阶层丧葬文化的标准配置，涵盖了从皇族元氏到胡汉大族的主要范围。在理想状态下，这一纪念装置于方正青石之上刻成，文字均匀分布于界线划分的界格内。文字内容一般由志题、志序与铭辞三大部分组成。其中志序按照姓名、郡望、家系、经历、品德、死亡、丧葬这样的经典顺序，叙写志主生平。而铭辞部分不仅由文学性颇高的四字韵文组成，其内容也要按照类似的模块构成，完成与志序的对应叙述。丧家需要委托专门的文士来完成这一工作。北魏洛阳时代精英阶层的墓志文化，直接决定了其后隋唐时代扩展至更大社会层面墓志文化的基本面貌。

不过，若将北魏此前百余年的平城时代也纳入视野的话，就会感受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墓志文化的风行，毋宁说更像一个突兀而至的“历史事件”，而非社会文化的渐进转变。平城时代虽然也有墓

铭、墓砖类型的文物出土，但数量不多，行用未广，使用者集中于因种种原因迁入平城的徙民群体。而构成北魏政权统治核心的所谓“代人”（包括皇族拓跋氏及其他胡族），尚未见有使用类似文物的迹象。这些文物大多形制粗陋，内容也比较简单，几乎不具备由四字韵文组成的铭辞。从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标准来看，难以“墓志”称之。而迁都洛阳之后，早在入葬于太和二十年（496）的南安王元桢这里，其墓志就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精美之作，志主身份和装置面貌都与平城时代的墓铭、墓砖类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基于这种对比，学者认为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流行的背后，或有朝廷方面的某种推动在起作用。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。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创生这一“历史事件”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？有哪些人、以怎样的方式卷入了这一事件？这一事件与孝文帝迁都这一更为宏大的“历史事件”关系如何？这些问题，都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若隐若现，而学者徒呼奈何。直到2010年，制作于太和十九年（495）的冯熙墓志与冯诞墓志先后刊布，才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真正的基础。

冯熙、冯诞父子的两方墓志

墓志概况与志主信息

冯熙墓志和冯诞墓志据说均出于洛阳市孟津县与偃师市交界处，时间分别为2007年冬和2008年冬。后洛阳当地学者李风暴、赵君平于2010年先后撰文介绍冯熙墓志，冯诞墓志拓片的公布则要等到

2012年《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》的出版。与近二十年来刊布的多数北朝隋唐墓志一样，这两方墓志亦为盗掘出土，相关墓葬信息自然付之阙如。观察冯熙墓志拓片，左方铭辞部分中间偏上位置，一圆形痕迹清晰可辨，或为盗掘者以洛阳铲下探时所伤及。冯诞墓志则志石右侧有一较大缺口，残损若干字。熙志言其葬于“河南洛阳之北芒”，诞志则言“葬于乾脯山之阴”。乾脯山推测地当汉魏洛阳城东北，与西晋帝陵相邻。

冯熙与冯诞为父子关系，出自北魏史上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家族。《冯熙墓志》称其为“文明太皇太后之兄，显祖献文皇帝之元舅也，又为国之外舅矣”。“外舅”即岳父，因孝文帝“前后纳熙三女，二为后，一为左昭仪”。平城时代后期，在冯太后的积极推动下，冯熙子女与北魏宗室及北族高门通过联姻，构建了庞大深广的权力网络。即使在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（490）去世之后，冯氏家族在平城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冯诞则为冯熙世子，与孝文帝同岁，二人关系甚密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记载“高祖宠诞，每与诞同舆而载，同案而食，同席坐卧”，亲近程度甚至超过了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。《冯诞墓志》的“幼以贵戚聪令，入侍禁幄。……年志协于辰御，居洛契乎轩禁”即是指此而言的。

从这种亲近关系来看，冯诞乃至冯熙家族应是孝文帝迁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，甚至可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然而太和十七年（493）八月孝文帝以南伐名义率大军南下，九月在洛阳“定迁都之计”，仅过了不到两年即太和十九年（495），冯熙和冯诞父子就先后因病去世，不能不说是相当突然的。《魏书·高祖纪》记载冯熙于十九年三月戊子（十九日）卒于平城。《冯熙墓志》则言“太和十九年岁在乙

亥正月辛未朔廿四日甲午，年五十有八，薨于代平城第”。前者记录的应是孝文帝在钟离前线接到冯熙凶问的时间，实际去世时间当以墓志为准。而冯诞在十九年初“从驾南伐”，二月廿二日病卒于淮南钟离前线，年仅二十九岁。

作为孝文帝统治圈的核心成员，冯熙和冯诞父子在死后都受到了极高规格的哀荣待遇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对此渲染有加，包括赠以高官、加以殊礼、给予美谥、皇帝亲送等多个方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冯熙卒于平城旧都，冯诞卒于钟离前线，但最终都葬于洛阳。这一点有赖于两方墓志的出土，得到了更为坚实的印证。在太和十九年（495）这一迁都伊始的敏感时节，冯熙父子入葬洛阳，应该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“迁都大业”的组成部分，被孝文帝着意经营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在冯熙所受哀荣的最后说孝文帝“葬日，送临墓所，亲作志铭”，对应的应该就是今天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这方冯熙墓志。

内容与面貌的差异

不过仔细对比两方墓志的内容与面貌，有两个问题却是不能等闲视之的。

第一，如前所述，冯熙卒于太和十九年（495）正月廿四日，冯诞卒于同年二月廿二日。而二人入葬时间据墓志可知冯诞是在五月四日，冯熙则在十二月廿六日。也就是说，虽然冯熙去世时间早于冯诞约一个月，但入葬时间却比冯诞晚了半年以上。卒葬之间相隔近一年，在中古时代也是颇为少见的。

很容易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之于地理空间的阻隔。冯熙与冯诞均葬于新都洛阳。冯诞跟随孝文帝南迁洛阳，后卒于南伐前线淮南钟离，冯熙则卒于旧都平城。似乎前者距

离洛阳更近。但实际上，如墓志所见，冯诞死后，遗体运抵洛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。而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（493）以南伐名义迁都，八月十一日从平城出发，三十日到达并州（今太原），九月廿日渡过黄河，廿二日即到达洛阳。十八年（494）十月正式迁都，改经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南下洛阳，费时也不过月余。冯熙如此之晚方才入葬洛阳，仅仅用地理因素来解释是行不通的。

第二，冯熙和冯诞父子二人身份相仿，均于太和十九年入葬洛阳。但两方墓志的面貌却有着相当的差异。冯诞墓志虽亦刻于方正青石之上，然既无志题，亦无铭辞。首先记录的是志主的卒日、官爵和姓名。这种起首方式实际上多见于北魏平城时代的墓铭、墓砖类文物，与十六国时期的丧葬文化一脉相承。其后叙述死亡和丧葬过程及哀荣，以“五月四日壬申，葬于乾脯山之阴”结束。最后略述志主出身和经历，并以“略诸玄志，掬铭泉堂”作结。这里的“铭”指的不是由四字韵语组成的“铭辞”，只是“刻写”之意。墓志全文以时间、地点、姓名、身份等具体信息的记录为主，少见文学性的表现。

对比来看，冯熙墓志已经是一派新貌。志石达72厘米见方。有独立成行的志题“太师京兆郡开国冯武公墓志铭”，且径称“墓志铭”，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。其后的内容由志序和铭辞两大部分构成。志序以“太师京兆郡开国公，姓冯，讳熙，字晋国。冀州长乐郡信都县人”起首，铭辞以“琼光肇姬，琇业阐晋。凝冯命姓，升燕祚胤”起首，其后均遵循出身、经历、品德、死亡、埋葬、悼念这样的经典顺序，完成两套相互对应的叙述文本。以本文开头所言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任一标准来